

空中英豪

美国第八航空队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

MASTERS OF THE AIR

AMERICA'S BOMBER BOYS WHO FOUGHT
THE AIR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美】唐纳德·L·米勒 著 / 小小冰人 译

下卷



指文图书®

空中英豪

美国第八航空队对纳粹德国的空中之战

MASTERS OF THE
AIR

AMERICA'S BOMBER BOYS WHO FOUGHT
THE AIR WAR AGAINST NAZI GERMANY

【美】唐纳德·L·米勒 著
小小冰人 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瑞士的囚犯

瑞士政府将美国飞行员扣为人质，
个中原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保守得最好的秘密之一。

——唐纳德·阿瑟·沃特斯，第 100 轰炸机大队飞行员

1944年3月18日，瑞士

当天雾气蒙蒙，空中覆盖着碎云，第44轰炸机大队的一架B-24“解放者”——“地狱厨房”号，向东面的博登湖（Lake Constance）飞去，那是德国与中立国瑞士之间边境线的一部分。“地狱厨房”号遇到了麻烦，它在博登湖德国一侧的腓特烈港上空被高射炮弹击中，两具引擎损坏，汽油从左机翼的油箱中喷出。这架飞机从上千英里外的东安格利亚飞来，已不可能再飞回去。离开编队后，乔治·D-特尔福德中尉告诉他的机组，他打算将飞机降落到瑞士的某个地方。

当天早上，中队的任务简报会上，特尔福德被告知，如果他的飞机在目标上空遭受到致命损伤，他可以飞入瑞士领空，并要求准许降落。关于瑞士，他知道的一点是，他所在的航空师里的一些机组降落到那里后，再也没有回来。

“地狱厨房”号靠近瑞士边境时，19岁的空勤机械师丹尼尔·卡勒（这是他的第二十五次，也是最后一次作战飞行任务）看见四架Me-109向他们包抄过来。卡勒中士很害怕。他的炮塔已无法正常使用，另外他也很厌恶空战。这个小伙子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他的寡母是一名虔诚的贵格会教徒，在她的抚养下，他成长为一名和平主义者。但珍珠港事件后，他觉得对国家的责任高于自己的非暴力誓言，于是说服伤心的母亲在他的入伍文件上签了字。卡勒需要家人的签字，因为当时他还不到18岁。截至那时，卡勒唯一杀过的动物是一只兔子，射杀兔子是为了将食物放上“家里肉食匮乏的餐桌”。¹卡勒对夺取生命一事非常敏感，以至于“地狱厨房”号投下炸弹时，他甚至可能会失声痛哭起来。“在这些任务中，我从未见到过一个敌人，挨炸的都是活生生的人啊！”尽管如此，他仍坚持参加飞行，作战也很英勇，因为他觉得有一种“反抗压迫”的道德义务。

就在他和其他射手准备向战斗机开火时，特尔福德中尉通过内部对讲机喊道，那些战斗机上有瑞士标志——两个白色的十字位于机身两侧。显然，这些是德国制造的飞机，但驾驶飞机的是瑞士飞行员。轰炸机上的射手们没有开火，但依然保持着戒备。一名说英语的战斗机飞行员用无线电联络上“地狱厨房”号，命令特尔福德放下起落架，否则他的飞机将被击落。这时，投弹手破坏了列为绝密的“诺顿”瞄准器，无线电操作员捣毁了电台，并将密码本撕掉。丹·卡勒将一些零部件从腰部舷窗丢出，并开始设法让飞机一着陆就起火燃烧。尽管对瑞士几乎一无所知，但他曾听说瑞士人将损坏的盟军飞机交给德国人，以换取战斗机，所以，他想确保“地狱厨房”号不会完整地落入敌人手中。

就在“地狱厨房”号降落在日内瓦城外的迪本多夫机场时，*卡勒走向机身后部，躲入机翼剖面的上方，粗大的燃油管在那里汇集，并暴露在外。他打

*译注：此处的日内瓦疑为苏黎世的笔误。

算用一把生锈的小刀将燃油管割断，打开油泵，等其他机组人员一离开，就用信号枪引燃这架轰炸机。就在他开始切割最粗的一根油管时，汽油喷得他一身都是，这时他注意到损坏的机翼上，油箱已因飞机着陆的震动而彻底破裂，整个机翼上满是汽油，他要做的只是向满是油气的空中来一发信号弹即可。其他组员从炸弹舱敞开的舱门离开后，卡勒从藏身处走上炸弹舱狭窄的过道，准备跳下飞机，并扣动信号枪的扳机。就在这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他的一只脚，把他拖了下来。卡勒死死攥着信号枪，准备发射，但有人将全身力气压在他握枪的胳膊上，并从他手中夺走了那支信号枪。

卡勒这才看清，按住他的几个人是瑞士士兵，但他们的做法很可能救了他的命。“我的身上沾满汽油，要是信号枪发射的话，不仅飞机会被炸成碎片，恐怕我也在劫难逃。一支瑞士步枪指着我的头，三名士兵按住我，我环顾四周，看见瑞士哨兵用步枪指着我们机组中的每一个人。对我来说，这里不像是个友好的地方。”

当天，另外15架美国轰炸机也在瑞士安全着陆或迫降。²卡勒看见几架轰炸机在“地狱厨房”后飞入迪本多夫机场，他后来回忆说，这些飞机的模样，“看上去都很糟糕”³。他不知道的是，一些轰炸机遭到瑞士战斗机和高射炮的射击。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整个战争期间，瑞士人至少打死了20名皇家空军飞行员和16名美国飞行员，另有大批盟军飞行员负伤。⁴降落在瑞士的168架美国轰炸机中，至少有21架遭到对方的攻击，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已明确显示出作战受损或发生故障的迹象。到1944年夏末前，一千多名美国飞行员落入瑞士人手中，他们受到瑞士士兵的看押，并被禁止在战争期间离开该国。这一千多人被拘押在中立的瑞士，他们的故事是二战中最大的秘密之一。

纳粹广播宣传员威廉·乔伊斯（由于他的口音，英国听众称他为“哈哈勋爵”）声称，这些美国飞行员带着他们的高尔夫球杆和滑雪板降落在瑞典和瑞士。“我们听到了在豪华度假酒店内喝着美酒、吃着美食并跟那些坏女孩约会的传闻。”美国飞行员勒罗伊·纽比回忆起他在战时对瑞士的印象。⁵瑞士

政府证实，被击落的飞行员被关在度假酒店里，许多降落到瑞士的飞机只是稍稍伤了点漆的传闻不胫而走。1944年8月，《科里尔杂志》刊登了一组奢华的照片：神情愉快的美国飞行员们滑雪、骑自行车，还在斯德哥尔摩的夜总会里跟深具魅力的瑞典金发女郎喝香槟。⁶

华盛顿的陆航队司令部内响起了警钟，根据报告所示，光是7月份便有45架美国轰炸机和1架“野马”在瑞士避难。早在3月和4月，第八航空队与德国空军的激战到达高潮之际，哈普·阿诺德将军便对美国轰炸机降落到中立国恼怒不已。现在，他给卡尔·斯帕茨发去一封怒气冲冲的信件，声称他有证据表明，大批降落到中立国的美国轰炸机“既未受到严重的战损，也未发生机械故障或燃料短缺”⁷。另外，他还指控说，据派驻瑞典、曾会见过被拘禁的飞行员的美国外交人员确认，“降落到这里的目的是故意逃避进一步的作战任务”。

要让卡尔·斯帕茨心烦意乱甚至发脾气并不容易，但这封信件做到了。他以近乎犯上的语言告诉阿诺德，他和负责地中海战区空中力量的艾拉·埃克，“痛恨将这些机组人员暗示为懦夫、士气低下或缺乏作战意志。这是对这场战争中最英勇的一群战士的无耻诽谤”⁸。

并不以冷静而著称的阿诺德反应过火了。在发给斯帕茨的备忘录中，他夸大了从派驻瑞典的外交人员那里获得的证据。他的怀疑仅仅是根据美国驻哥德堡领事威廉·W·科科伦的一封来信，而科科伦则是个以反复无常而出名的家伙。科科伦指责被拘禁在该国的美国飞行员“完全没有爱国心”，并以“一切可能的手段”积极逃避额外的服役期。⁹这番鲁莽的指控助长了阿诺德的关注，他认为最近在中立国的一连串着陆是一个更大的问题的苗头：疲劳和严重的损失造成机组人员的士气严重恶化。甚至在写信给斯帕茨之前，阿诺德已经展开三项独立调查：其中的两项是与被扣留在瑞士和瑞典的机组人员会面，并检查他们的飞机；另一项调查由总部工作人员进行，研究整个欧洲战区作战机组的士气问题。

这些调查正在进行之际，当年8月，阿诺德收到一份来自巴恩韦尔·瑞特·莱格准将的公文，他是美国驻伯尔尼使馆的武官，这份公文向阿诺德透露了瑞士的真实情况。莱格声称，他在劝阻那些被阿诺德指责为“试图躲避战事”的飞行员不要逃跑的问题上遇到些麻烦，这些飞行员想从“慈善的主人”那里逃走，甘愿冒上巨大的个人风险，在法国地下抵抗组织的帮助下返回英国。¹⁰这些飞行员为什么要逃离他们舒适的监禁地（高山度假村）？莱格将军为何要阻止他们？这些都是阿诺德要问的问题。

随着陆航队调查人员对瑞士的拘禁条件加以更仔细的调查，他们会发现一场严重的士气危机，尽管不是阿诺德所怀疑的那种。战争期间，1740名美国飞行员被扣留在瑞士，这个数字中包括“被拘留者”（1516人）和降落在敌方领土后设法逃入瑞士的“脱险者”，其中的947人试图逃跑，有些人甚至试了两三次。¹¹相比之下，被拘禁在瑞典的1400多名美国飞行员则很少有人想逃跑，尽管没有准确的官方统计。从瑞典逃回英国非常困难，而在四个专门为他们设立的拘留营里，这些飞行员受到良好的对待，他们都遇到会说英语、态度友好的瑞典官员，这些官员为他们提供了大量的娱乐设施，并给他们签发前往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大城市的定期通行证。由于向德国销售铁矿石，瑞典政府处在美国沉重的外交压力下，因而加快了美国飞行员的遣返工作，这就使他们完全没必要冒着危险逃跑。即便有几个因不耐烦而试图逃离的飞行员，出于对美国经济制裁的担心，瑞典的官员们也不愿阻止他们。

瑞士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尽管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出了强烈的抗议，但瑞士政府直到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才开始遣返被拘禁的美国人。瑞士的宪兵积极追捕逃往边境的美国飞行员，不仅开枪，还射伤了其中一些人。那些被抓回来的人被判以不确定的刑期，非正式负责被拘禁美国军事人员事务的莱格准将对此听之任之。他以军事法庭相威胁，警告美国飞行员们不要逃跑。莱格告诉斯帕茨设在伦敦的司令部，逃跑的企图会使“主人们”不快，并延缓他为美国飞行员们获释而进行的秘密谈判。¹²但莱格更关心的是如何讨好瑞士，而不是

让被拘禁的美国人获释，逃跑的美国同胞被瑞士人抓回后加以囚禁，他带着不可原谅的冷漠查看了他们恶劣的监狱条件。战争的最后两年中，“慈善的主人”将187名美国飞行员关入欧洲最令人厌恶的监狱之一，管理这座惩戒营的是一个残酷成性的纳粹。丹尼尔·卡勒就是这些不幸者中的一个。

高山拘禁

降落在瑞士不到一个小时，卡勒所在的机组和当天下午降落在迪本多夫机场的其他美国机组人员便被武装警卫带至一个大礼堂，在那里，瑞士官员向他们简单介绍了监禁事项。他们被告知，当天晚些时候，火车会送他们到一个特别营地，该营地设在这个国家中部的一片隔离区内，他们会在那里先被隔离两周，然后在哨兵的看守下度过战争剩下的时间。他们最终会获得自由，但未经批准擅自逃离隔离区的人会遭到追捕，并被送入一座监狱。瑞士士兵已接到命令，如果对方不听从“停下！”的命令，他们将向试图逃离者开枪。由于瑞士是一个非交战国，这些飞行员并不被视为战俘或脱险者，携带武器并自愿进入这个国家的人便被列为“被拘禁者”。但在几乎每个方面，他们受到的对待都很像战俘，尽管他们被剥夺了《日内瓦公约》赋予战俘的许多权利。

在迪本多夫机场礼堂进行情况简报时，被俘的飞行员们看见台上瑞士官员的身旁坐着一名美国将军，他们肯定深受鼓舞。他们确信这是一场小把戏，他们是花了大价钱训练出来的美国飞行员，国家已经派人来到这里，他肯定能让他们回到各自的中队并再次投入战斗。但莱格将军（这个肥胖的一战骑兵军官穿着马裤和齐膝高的皮马靴）却以严厉的警告结束了简报会。企图逃跑的被拘禁者不会获得美国领事馆或美国武官的帮助，他们将受到瑞士法律的约束。莱格说，被拘禁者会得到良好的对待，应该耐心等待。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他们会获得遣返。丹尼尔·卡勒仔细聆听着，他被搞糊涂了。这位将军的警告与他在英国所接受的指示相冲突：被俘的飞行员应该设法逃脱，并返回自己的原

部队。“据我看，尽管他们称我们为一个中立国的‘被拘禁者’，但事实上，他们将我们置于枪口下，使我们成了囚犯。”若干年后，卡勒这样写道。¹³

卡勒中士所在的机组被送到阿德尔博登（Adelboden）的一个主拘禁营，这是个空置的避暑山庄，位于日内瓦湖东北方30英里处。从弗鲁蒂根（Frutigen）火车站通往阿德尔博登，只有一条蜿蜒的盘山公路。营地指挥官是一名金发碧眼的军官（他令卡勒想起在电影中见到的那些党卫队成员），他将军官和士兵们分开，并分配到各自的宿舍中。他们就这样住进了简陋的度假山庄，处在不间断的看押下。他们受到不错的对待，但条件很不理想。整个国家都处在严格的配给制下。¹⁴战时的瑞士，热水是个奢侈品，每十天供应一次，每次只有短短的几个小时。寒冷的天气里，宿舍里没有可供取暖的煤，他们穿着飞行服，戴着手套，吃着少得可怜的黑面包、土豆和稀薄的汤。肉，每周供应一次，样子还很吓人——通常是山羊肉做成的血肠。由于饮食的贫乏，半数以上的人患了肠胃和口腔疾病，这里没有医疗和口腔护理，除非是非常紧急的状况。一些在最后一次作战行动中负伤的飞行员，不得不等待几个月后才被送入医院。在瑞士降落时，丹尼尔·卡勒患了严重的冻伤，没过几天，脚上的皮肤开始发黑。他被告知，一名瑞士军医下次到阿德尔博登来时，就会为他提供治疗，但这个军医从未出现过。而瑞士却一直派遣医疗队在东线帮助德国军队。

阿德尔博登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无聊，最盛行的运动方式是饮酒，经常会过量。这些飞行员从美国驻伯尔尼领事馆收到一些微薄的津贴，以替代他们的飞行津贴，用这些钱，他们可以给自己买酒喝，有些人甚至一醉好几天。¹⁵书籍和信件从家里邮递过来，飞行员们还被允许在当地的山坡上滑雪，或独自到镇上逛逛，但在天黑前必须返回宿舍。小小的弗鲁蒂根镇上没什么姑娘，但年轻的美国飞行员挤满咖啡屋的消息传播出去后，来自伯尔尼和苏黎世，衣着入时的女人们开始在周末频繁光顾这个度假小镇。“她们中的许多人嫁给了军官，”战时的一位居民回忆道，“但她们独自来到阿德尔博登，来一场‘冒

险’。她们会遇上这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年轻飞行员。”¹⁶

尽管与瑞典的“被拘禁者”相比，这里的外出旅行受到更多的限制，但一名品行良好的飞行员也可能会获得一张特别通行证去参观另一个镇子，如果他能得到一个瑞士家庭的正式邀请的话——也许是在当地滑雪场上邂逅的某个深具魅力的姑娘的父母。但这些精力充沛的战士想得到的只是性和友谊，而不是持久的关系。整个战争期间，只有两名被拘禁的美国人迎娶了瑞士妇女。过了一阵子，单调、无聊、简陋的条件，再加上位于法国的盟军越来越逼近，被莱格将军描述为“重返战场的呼声”¹⁷激发起他们逃跑的冲动。可是，逃亡的障碍令人望而生畏。

一些飞行员进入深山远足，武装卫兵陪伴着他们，同时担任向导。那是一片童话般的美景：教堂的钟声每隔一个小时便会响起，冰川湖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像巨大的宝石那样熠熠生辉。但一些人回来时无比沮丧，回到宿舍便倒头睡去。只有出色的登山者才有机会翻越阿尔卑斯山众多的山峰逃生，这些高耸的山峰就像监狱的墙壁，环绕着深邃、满是松香味的山谷。即便穿越过无法逾越的山脉，各个方向都是通往纳粹德国的。“自从有过瑞士的经历后，我对山峰始终怀有不同的心境，”飞行员马丁·安德鲁斯回忆道，“我觉得它们很美丽，但也有种压迫感。”¹⁸

卫兵们告诉卡勒，这些他所厌恶的山峰防止了他们的国家被德国军队侵占。他们还告诉他，瑞士居民中，60%的人有德国血统，许多瑞士人加入了当地的纳粹团体，他们不可能协助一名美国人逃跑。这些话半真半假。

瑞士的中立立场

凭借其强大的阿尔卑斯山防线和一支435000名士兵的军队，再加上斗志昂扬的民兵组织，瑞士是个很难被征服的国家。但希特勒并不需要这个阿尔卑斯山堡垒臣服，通过恐吓和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手段，他从瑞士得到了大多数他

想要的东西。

大多数瑞士公民支持盟军，反对纳粹分子接掌他们的国家，但这个国家至少有40个法西斯主义和极端爱国主义组织存在，有些组织甚至在150多个社区拥有基层机构和地方分部，大多位于以德语为主的州。在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积极支持下，柏林为这些亲纳粹组织提供了资金和指导，这些组织都持积极的反犹主义。德国驻伯尔尼领事馆公开支持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个分支机构，该机构吹嘘说，他们有好几万坚定的追随者。¹⁹历史学家艾伦·莫里斯·朔恩写道：“整个欧洲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拥有这么多与其人口和地理区域成比例的类似团体。”²⁰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从劳动者和中下阶层吸收成员，但半保密的“瑞士祖国协会”的主导力量却是由战时统治瑞士的政治、商业和军事领导者所组成的三驾马车。（今天，该组织亲纳粹和反犹主义出版物的副本，从瑞士各图书馆和学术资料库中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祖国协会的领导者主要负责瑞士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之间牢固的经济关系。²¹这种关系是瑞士联邦委员会（该国的七人行政机构）里通外国的总统马塞尔·爱德华·皮莱-戈拉不遗余力培养起来的，但它也植根于瑞士极端的经济脆弱性：该国几乎所有的燃料和大部分食物都依赖进口。瑞士从德国购买煤和农产品，并以铁矿石回报。作为一个中立国，瑞士拥有与德国和意大利的合法贸易权，但国际法禁止一个中立国向交战国供应任何战争物资。瑞士违反了这一法令。祖国协会的成员瓦尔特·斯坦普夫里，组织起瑞士的工业生产，以满足纳粹德国的需求。瑞士的各大银行（纳粹德国银行家们的首选）为纳粹德国的武器生产提供资金，瑞士的各个行业为德国的战争机器生产出大量必需品，包括机床、航空机炮、无线电零部件、军用卡车、货车、化工品、染料、工业钻石和滚珠轴承。希特勒的同情者埃米尔·比勒所领导的庞大的厄利空工厂，为德国空军生产120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厄利空工厂的其他军工品也出现在德军几乎每一个单位的武器库中。瑞士还在德国境内建立起军工厂，其

中的一些在党卫队的指导下使用了奴工。这些工厂中，位于德国南部的几座属于国际红十字会主席马克斯·胡贝尔博士。1942年，瑞士出口产品的97%以上流向轴心国或是他们的合作者。

罗马尼亚的石油经海路运往意大利，再由穿过瑞士的铁路线转运至德国，来自土耳其和巴尔干地区的镍、铜和铬同样如此。²²意大利与德国之间，穿越瑞士领土所进行的贸易活动也很活跃。历史学家凯瑟琳·J·普林斯写道：“瑞士的铁路系统，甚至包括瑞士本身，有效地属于纳粹德国。”²³纳粹强盗从集中营遇难者嘴里拔下的金牙所融成的金块，以及从德国上流犹太人家中没收的艺术品（这些犹太人已被送往死亡营），都被存放在瑞士的银行里。

战争期间，瑞士收容了大约20万难民，其中的28000人是犹太人，但瑞士的犹太社区和其他组织靠收取人头税来帮助他们。另外，瑞士拒绝了成千上万名向该国寻求避难的犹太人，其中一些遭到逮捕，并被转交给德国和法国维希政府。²⁴1938年，瑞士司法和警察部长海因里希·罗特穆德博士建议德国官员，犹太人的护照上应该加盖上一个红色的“J”，以方便瑞士边境警察识别他们。

在防御问题上，战时瑞士政府向盟国解释说，他们不愿成为地理上的囚犯。1942年11月，维希法国被占领后，整个瑞士被轴心国所包围，最靠近的自由国家也在1000英里外。盟国的特别外交压力，再加上瑞士也意识到盟军将赢得这场战争，这才说服这个已有700年民主历史的政府于1945年2月改变了他们的经济政策，不再向第三帝国出口与战争有关的产品。但不顾盟国的要求，瑞士国家银行继续接收装满德国银行劫掠来的黄金的车队。直到欧战结束前的一个星期，瑞士联邦委员会才宣布所有纳粹党基层组织为非法组织。“最终在1945年4月，瑞士屈服了——只比约德尔将军早了一个星期。”外交家迪安·艾奇逊写道，他后来成为杜鲁门总统的国务卿。²⁵

担心遭到报复或领土的完整性受到侵害，瑞士政府允许德国空军在达沃

斯的一家豪华酒店为他们的飞行员设立起一个休息区，那里是一片遍布森林的山区度假胜地。受损的德国战斗机也被允许在瑞士机场着陆，而这些机场通常会对飞入的盟国飞机开火射击。“什么中立国？你只是想降落在那里，亲吻大地，可他们却朝你开火。”一名美国飞行员抱怨道。²⁶但这位小伙子没有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瑞士的炮手们就有理由保持高度警惕。频繁而又壮观的大规模轰炸行动距离瑞士边境很近，美国航空队经常会侵犯瑞士领空，有时多达数百架，尽管大多出于意外，但还是激怒了赫尔曼·戈林，瑞士空军的大部分装备都是从他那里购买到的。战争期间，美国轰炸机有几次误炸了瑞士的城市，包括伯尔尼、巴塞尔和苏黎世。最严重的一次意外发生在1944年4月1日，沙夫豪森（Schaffhausen）遭到20架B-24“解放者”的轰炸，这些飞机在厚厚的云层中迷了路。他们认为自己正位于敌方城市的上空，炸弹投向市中心，40名平民丧生，100多人受伤。瑞士政府要求并得到了正式道歉和赔偿，但这并未平息边境社区瑞士人的怒火。也许不是历史中的一个意外事件，沙夫豪森遭到轰炸的当月，瑞士战斗机和高射炮手击落了一架严重受损的B-17“小鲑鱼”号，当时，这架轰炸机的两具引擎冒烟，左前轮被击落，正准备在苏黎世附近迫降。六名机组人员身亡，其中一个是被迫在600英尺高度跳伞时丧生的。美国领事馆提出抗议，声称“美国轰炸机以类似的信号回复了瑞士战斗机发出的绿色火箭信号后，仍遭到后者的攻击”²⁷。对方的回应很简短，只是提到发给瑞士空军人员的指示“已经作出改变，部分原因是因为此次意外”²⁸。

身处阿德尔博登的美国飞行员们忍受着东道国对希特勒的绥靖以及他们对盟国空军入侵越来越大的不耐烦。如果瑞士真的站在中立国立场，这些人和另外两个拘禁营里的美国飞行员就该获得与身处瑞典的美国飞行员同样多的自由，被拘禁在瑞典的美国飞行员，许多人在该国的飞机厂干活，住在舒适的高级酒店里。事实上，被拘禁在瑞士的美国飞行员待在营地，等待着战争的结束，很少受到瑞士士兵的虐待。但那些大胆逃跑的飞行员则进入到一个全副武

装的国家，这里的忠诚形形色色，而该国的士兵、警察以及法院人员已接到命令，严惩被抓获的美国飞行员。

沃维尔莫斯的黑洞

丹尼尔·卡勒对陌生的东西感到害怕。他在印第安纳州与世隔绝的锡拉丘兹长大，从未在离家30英里以外的地方溜达过。但他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逃入一个陌生的世界，“以便重新参加战斗，反抗压迫……”²⁹他的爱国主义情绪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甚至觉得有些做作。但为了国家的战争而放弃贵格会信仰，他认为自己放弃了进入天堂的一切机会。他只希望上帝已创造出一个特别的地方——离天堂近些，但远离地狱——专门留给那些为了一个正派的原因而打破杀戒的人。

卡勒第一次逃跑是在1944年5月，他和两名同伴迷了路，差点死在意大利边境的山区森林中。脚上血痂带来的难以忍受的疼痛，误食毒浆果造成的病症，这一切使他几乎无法行走，卡勒独自搭乘火车返回阿德尔博登，同一列火车曾把他和他的同伴送至贝林佐纳（Bellinzona）南部，那是意大利边境上最大的一座城市。“这次逃亡最神奇的是，我搭乘瑞士公共交通系统逃出去500多英里，从未有人盘问我，或要我出示证件。”³⁰原因之一是，他已经穿过意大利，而不是瑞士的德语地区，那里的警察更加警惕。瑞士“被拘禁者和住院治疗”委员会在战后发布的一份报告提供了另一个解释：“我们尽了一切努力防止被拘禁者逃跑。遗憾的是，我们的努力受到阻碍，事实上，很大一部分居民对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为被拘禁者逃跑提供帮助而感到荣幸。”³¹

向阿德尔博登的指挥官报告后，卡勒被处以在弗鲁蒂根监狱禁闭十天的惩罚。他后来得知，他的同伴被瑞士边境哨兵抓获，并被关了起来。十天禁闭期过后，卡勒被送往一座高度戒备的惩戒营，名叫“沃维尔莫斯监狱”，英语的意思是“位于沃维尔沼泽地里的监狱”，这是个靠近卢塞恩（Lucerne）的

村落。卡勒从未被告知他为何被送至这里，或者要在这里关多久。就在他走进监狱大门时，看押他的哨兵对他低声说道：“我很抱歉把您带到这个地狱里来。万事小心。这里的家伙都很可怕，而您，太年轻了。”³²

沃维尔莫斯是一座封闭、满是泥泞的营地，四周环绕着高高的铁丝网，巡逻的哨兵携带着机枪和警犬。这座惩戒营修建于1941年，专门用于关押来自十几个国家被监禁的军事人员中的不法分子和逃跑者。为管理这座营地，瑞士当局派了个坏得无法再坏的人选——法国外籍军团的前军官，安德烈-亨利·贝甘上尉，他是个既残酷又腐败的家伙。当时，他正因通奸、受贿、挪用监狱公款、为德国人充当间谍以及非法穿着纳粹制服（战前居住在德国时，他在信件中的签名总是“希特勒万岁”）等罪名受到瑞士当局的调查。由于体重严重超标，他很少进入监狱，而宁愿坐在他的办公桌后处理事情，在这里，他偶尔会跟四个情妇中的一个“放松”一下，在这里，他还可以方便地没收邮寄给囚犯们的救济包裹。他所任命的官员都和他一样，粗俗、贪腐成性。“（他们）把我们当作败类般对待，”第八航空队的投弹手詹姆斯·米苏拉卡说道，“瑞士人称这里是惩戒营，但这里更像个集中营。”³³

丹·卡勒被卫兵推入九号营区的大门时，差点被营区内的恶臭熏昏过去。他在印第安纳州任何一个谷仓里闻到的味道都比这里好得多。木地板上铺着脏兮兮的稻草，犯人们睡在上面，而在门外臭气熏天的窄沟里大完便，他们就用这些稻草当卫生纸用。“当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以及后来更多的遭遇，是一名犯人不得不忍受的人间地狱。”卡勒在他生动的监狱回忆录中写道。³⁴一群俄国人把他按住，用稻草堵上他的嘴，多次鸡奸了他。“我来自农村的小地方，从未听说过男人可以做这些人对我所做的这种事。我……甚至从未跟一个姑娘做过，除了握握她的手，并在她的面颊或嘴唇上轻吻一下。我身上所有的口子都在流血，我不禁祈祷上帝，把我的生命带走吧。”

第二天早上，他再次遭到强奸，并被迫为几个攻击他的家伙口交，他们将木棒塞入他嘴里，把他的嘴撬开。他被打晕，苏醒过来后发现鲜血流入喉咙

中。他虚弱得无法动弹，双手反绑在身后，被丢在营房外的一条废沟中。“终于恢复意识后，我从沟里爬出，试着用稻草擦拭身体，这才注意到有些东西挂在肛门外，随即意识到那是一截肠子，我又把它塞了回去。”

几个小时后，卡勒挣扎着走进贝甘的办公室，失声尖叫起来。“他们都盯着我，好像我是某种怪物，一种不怀好意的笑容出现在他们的脸上。”这个贵格会牧师的儿子平生第一次朝其他人大骂起来，但没人明白他的话，没人会说英语。贝甘对卡勒感到厌烦，他站起身，用总是带在身边的马鞭指指房门，他的卫兵立刻将卡勒扔了出去。卡勒面朝下倒在土路上，不禁祈祷四处游荡的警犬过来咬死自己算了。

跳蚤，再加上被老鼠粪便污染的稻草，没过几天，卡勒的身上长满了疮。强奸仍在继续，而且越来越暴力。他开始吐血，并吐出一种不知是什么的黄色物质，病情发展为慢性、出血性腹泻。一名英国军士长来视察监狱，看望英国囚犯时，卡勒问他，为何红十字会不到这里来视察，他为何未经审判就被关押在这里，为何美国驻伯尔尼的武官莱格将军未被告知自己被关在这里？

在随后的一次视察中，这位军士长告诉卡勒，他已通过驻伯尔尼的英国人员通知了美方代表，但他被告知，莱格将军不相信瑞士居然存在像沃维尔莫斯监狱这样的地方，另外，他的官方立场是，如果一名美国飞行员试图逃跑，他就该受到瑞士当局的惩罚。

在卡勒看来，他为之奋战的国家抛弃了他，而瑞士，这个派出红十字会代表团监督德国战俘营条件的国家，对视察一座中世纪般的临时监狱没什么兴趣，可这座监狱距离日内瓦国际红十字会总部还不到100英里。“（沃维尔莫斯监狱）没有任何虐待行为，”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份检查报告中指出，“相反，对部分监狱指挥官的管理倒是很严格。”³⁵这里有“铁一般的纪律”，一名瑞士少校查看了沃维尔莫斯监狱的条件后说道，但这是“必要的”。至于贝甘，他补充道，是个“理想的人选……非常适合管理此类监狱”。这位瑞士军官以他所能给予的最高赞誉结束了他的报告，他说，该监狱的文件“保存得并

井有条”。³⁶

当年晚些时候，莱格将军终于获悉了沃维尔莫斯监狱，但他起初并未采取行动。他没有实施干预，以帮助被关押在那里、人数不断增加的美国飞行员，相反，他对惩戒营的存在视若无睹，认为这能阻止进一步的逃跑行为。针对被拘禁在该国的所有美国飞行员，他签署了一份公告，警告他们，任何一个企图逃跑的人“都不会从我这里获得支持以对抗瑞士拘禁部门所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他将被送往沃维尔莫斯监狱关押5—6个月”³⁷。飞行员们不知道的是，在国务院的压力下，莱格已开始与瑞士商谈遣返所有美国飞行员的事宜，不断发生的逃跑妨碍到他的努力。战争末期，他也为沃维尔莫斯监狱恶劣的条件几次向瑞士当局提出正式抗议，³⁸几十名美国飞行员未经审判便被无限期地关押在那里。但这并不能为他拒绝视察沃维尔莫斯监狱，或未能在更早些时候采取密切的调查以确实该监狱的存在提供任何借口。

卡勒终于被带离沃维尔莫斯监狱，并被送至法庭，他发现瑞士的司法简直是荒唐可笑。³⁹军事法庭的程序完全用德语进行，等这一切结束后，卡勒拿到一份被翻译成英文的副本。他没有得到任何医疗救治，还要被送回沃维尔莫斯监狱，再过上一段未明确说明期限的日子。他拿到的那份庭审副本中，没有收录他提供的遭到强奸和监狱内部条件的证词中的一个字。最后一个侮辱是，他还收到一张18瑞士法郎的账单，以补偿他给法庭带来的麻烦。

回到监狱，卡勒忍受着强烈耳鸣的折磨——这是他被俄国人殴打的结果。那些俄国人已被转走，但独自坐在营房的角落，裹着薄薄的毛毯，卡勒觉得自己要疯了。“我记得沃维尔莫斯监狱的最后一件事是，我像个疯子那样，试图将稻草塞入自己的喉咙，以便让自己窒息而死。”就在渐渐失去意识之际，他听见那名英国军士长向两名试图让他苏醒过来的瑞士看守大声喊着命令，“随后，眼前一片漆黑”。⁴⁰

后来，那名英国军士长告诉他，在他的坚持下，英国政府派驻伯尔尼的代表让一名瑞士外交官签署了一份文件，要求立即让卡勒获得医疗救治。